

上海经济增长中的适度流动人口问题探讨

王红霞,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摘要: 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大中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根据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的关系论述了现阶段在各大中城市对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进行适度控制的必要性, 并以上海为例, 借助于城市生产函数建立了一定时期内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模型, 定量地分析、测算了与上海城市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适度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4)03-0029-05

The Issue of Optimum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ghai with Economic Growth

WANG Hong-xia, WANG Gui-xi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en a big issue for most of the large and middle size cities in China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floating population size and to keep a reasonable structure in these cities. Take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using city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paper sets an optimum floating population model. Through this model, the paper calculates and forecasts optimum siz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ghai,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optimum floating population

自改革开放以来, 流动人口就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各大中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 进入上海的流动人口规模逐年增大, 例如: 到2000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有387万人, 已经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3.6%。流动人口的增加, 一方面改变了上海劳动力结构供需失衡的矛盾, 为上海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一方面也渐渐给上海的劳动力市

场、企业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如何合理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减少流动人口给城市发展带来的不良冲击, 从而充分利用流动人口优势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就成为目前上海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亟需解决的难题。鉴于此, 本文将从城市经济增长的角度, 结合城市人口预测模型, 定量分析与上海发展相适应的适度流动人口, 以期能为上海科学、合理地控制流动人口提供有益借

收稿日期: 2003-08-05; 修订日期: 2003-12-02

作者简介: 王红霞(1973-), 女,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一、适度人口与城市流动人口控制

适度人口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初期。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 (Alfred Sauvy) 把适度人口定义为“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1]。埃德温·坎南 (Edwin Cannan) 着重从人口与生产率、收益的关系来分析适度人口。他认为, 在任何一定时期, 或者在任何特定条件下或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 总有一个可以称为获得最大收益点, 此时人口数量刚好如此恰当地适应环境, 以致无论人口是多于或少于此时人口, 收益 (或劳动生产率) 都会下降 (或递减)。这种状态下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也就是说, 适度人口是能够使产业获得最大收益 (或劳动生产率) 的人口。后来, 经济学家马克·纳拉伍等人将适度人口理论与人口政策、技术进步、社会福利及资源约束等结合, 使适度人口理论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综合前人研究, 我们认为所谓适度人口是指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等相适应, 能够使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规模。由于适度人口有利于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因此, 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量处于适度规模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题来说, 控制流动人口的适度规模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 城市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在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取得更好的工作、赚取更多的收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 有约 70% 的人口因“务工经商”等经济理由而迁移或流入城市)。可见,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较高的收入和良好的就业机会。因此, 这就决定了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劳动适龄人口 (来自各大中城市及上海的人口调查的统计资料显示: 15~ 64 岁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 85% 以上, 15~ 39 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则占总流动人口的 70% 左右)。毋庸置疑, 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进入必

然影响一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当然, 如果外来劳动适龄人口进入的是开放的、所有劳动力都是依据市场调节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那么在市场的作用下, 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进入将有效地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然而, 当外来适龄人口面对的是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的劳动力市场时, 外来劳动适龄人口的进入必然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也就是说, 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并不完全是受市场调节的作用, 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同时还要受到政策影响和户籍制度的束缚, 因此当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需求不会有大幅波动而劳动力供给量却大幅增加时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要素价格扭曲甚至“市场失灵”。在这种状况下, 惟有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使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保持大致平衡, 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然而, 众所周知, 我国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隔状态, 既有城市正式部门 (如国有、集体、现代公司与企业等) 高工资的正规劳动力市场, 也有城市传统部门 (如制造、加工、建筑等行业) 低工资的从属劳动力市场^[2]; 因此, 在这种城市劳动力市场开放尚不完全、劳动力自由流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的状况下, 实行对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进行适当控制乃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此外, 由于城市中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层, 流动人口的市场进入同时还受到受教育程度、当地政策和人文风俗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因而许多外来劳动力很难进入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都相对较高的中、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这一方面将导致上海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上海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上海市总流动人口的 85.1%, 而且, 近两年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也表明, 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的平均文化层次明显落后于深圳、北京); 另一方面, 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流入还将阻碍甚至威胁着上海的经济发展。因而, 如何合理、科学地控制流动人口的适度规模, 使之在上海现有的生产条件下, 既能使社会经济收益最大化, 又能实现上

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当务之急。

二、城市就业增长与流动人口吸纳:理论探讨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增长必将带来就业的增长。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开始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产业结构和政策同样影响了就业的变化;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因为产业结构和政策的调节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①,所以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其经济的增长。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自然也不例外。城市的经济增长支持城市进行扩大再生产,城市生产的扩张不仅带来资本的扩张,而且也必增大就业的需求量。然而,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众多城市目前发展所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上海在这方面尤为严重:一方面,上海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大幅度延长,上海市统计局统计显示,2000年时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5%,大大高于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7%的水平;另一方面,上海的生育水平呈下降趋势,上海户籍人口从1993年即开始进入自然负增长阶段,“少子、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使上海本市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大受影响^[3]。在这种状况下,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增长已经难以适应和满足城市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城市就业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只能一部分来源于本地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包括自然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和现有的剩余或失业劳动人口),一部分来源于外来劳动力即流动人口的劳动力补充。基于此,我们尝试构建流动人口规模模型对上海市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和度量。

1. 基本模型

假设一个城市用C-D生产函数表示为 $Y = AK^\alpha L^\beta$,其中A为技术,K为资本,L为劳动力, α 、 β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且 $\alpha + \beta = 1$,即城市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条件;同时依据托达罗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理论,假设流

动人口进入城市是为了谋取就业岗位而且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不存在失业(也就是说,城市现有的失业人口皆是本城市的本地人口而非外来的流动人口),那么预测期(以年为单位;以下不再特别说明)内流入一个城市的人口量(P_t)就应该是该年该城市新增就业需求量($\square l$)与其劳动力自然增长量($\square L_n$)和现有剩余或失业劳动力人口($\square L_u$)之差,于是一个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规模可表示为 $P_t = \square L - \square L_n - L_u$ 。

由城市生产函数可知,

$$\square L = \frac{\square Y}{Y} \frac{\square L}{L} = Y \square \frac{L}{Y} \quad (\text{我们用GDP来表示城市产出 } Y, y \text{ 是GDP增长率})$$

表示城市产出 Y , y 是GDP增长率)

令 $\square L_n = p_{-15}$,即预测期内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量为新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数,我们以15岁为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限并假设新生儿死亡率为零,则预测期内自然增长的劳动力人口可通过以预测年为准15年前的新出生人口(p_{-15})来确定。因此,在预测期(t)一个城市可以吸纳的流动人口规模为:

$$P_t = y_t \frac{L_{t-1}}{\beta} - p_{-15} - L_n^{t-1}$$

在上式中, L_n^{t-1} 是本城市基期的失业人口, p_{-15} 、 L_{t-1} 都为已知变量,如果政府确定了预测期的经济增长目标 y_t ,那么只要知道了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我们就可以粗略计算出预测期的总流动人口规模。

2. 上海适度流动人口规模的测算

通过构建上述模型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得知劳动的产出弹性 β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城市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较为准确的度量。我们通过分析上海市的历史数据发现,自1990年以来,上海市的资本收入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在45%左右,因此我们取 $\alpha \approx 0.45$,显然有 $\beta \approx 0.55$ 。假设我们以2000年为基期,那么,根据统计资料有 $p_{-15} = 9.86$ (万人), $L_n^{t-1} \approx 56$ (万人), $L_{t-1} = 1640.77$ (万人);若上海2001年能实现GDP增长10.8%的目标(即维持2000年的经济

^① 否则,即使产业结构和政策调节能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但如果生产效率持续得不到提高,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不前,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就业增长也必然不能维持。

增长速度), 则 $P_t = 256.33$ (万人); 若以上海“十五”期间保持 10% 的 GDP 增长率, 则“十五”期间有 $P_t = 232.46$ (万人)。显然, 未来三年上海经济增长可以吸纳的流动人口规模为 250 万人左右。而且, 如果我们进一步以 (1.27%, 10%) 的失业率上下限来测算, 那么上海市经济增长可以吸纳的流动人口应控制在 124.38—267.62 万人之间。根据目前上海流动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约为 87.54%), 再加上一定的预测误差(5%), 我们可以粗略估算出未来三年上海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大约在 160 万人至 325 万人之间(如果从上海总的适度人口规模推算, 即适度流动人口规模 = 适度总人口数 - 常住人口数, 那么, 根据彭希哲和陈家华^[4] 等学者对上海市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的测算, 到 2005 年上海市的经济适度人口规模为 1770 万人左右, 根据王桂新学者对上海未来人口增长变动预测, 上海户籍人口数到 2005 年时为 1358.21 万人, 考虑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误差, 则未来三年上海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应该为 350 万人左右。可见, 与本文预测结果基本一致)。

此外, 由上文分析不难推知, 各个产业经济增长可以吸纳的流动人口规模(iP_t) 如下:

$$iP_t = \gamma_i \frac{L_{t-1}}{\beta} - i \square L_t$$

其中, i 代表各个产业, $i = 1, 2, 3$, γ_i 是第 i 产业在预测期的经济增长率, $i \square L_t$ 是第 i 产业在预测期的本地新增劳动力, 其余意义同上。根据上海市“十五”发展纲要, 上海到 2005 年要实现三、二、一产业结构比例为 55: 43.8: 1.2 的发展目标, 那么上海二、三产业至少应分别保持 12.5%、15.5% 以上的增长速度。受资料所限, 本文以 2000 年为基期测算了未来三年上海第二、三产业可以吸纳的外来流动人口规模(数据说明: $i \square L_t =$ 失业人口数 \times 本产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重; $\beta_2 = 0.535$, $\beta_3 = 0.74$)^[5] 分别约为 130.29 万人和 141.78 万人, 也就是说, 为保证顺利实现“十五”发展纲要, 上海吸纳的流动人口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应控制在 1: 1.09 左右。然而, 上海目前流动人口中从事

二、三产业的比例约为 1: 0.92, 因此, 流动人口的产业结构也急需进一步改善。

3. 流动人口结构控制与城市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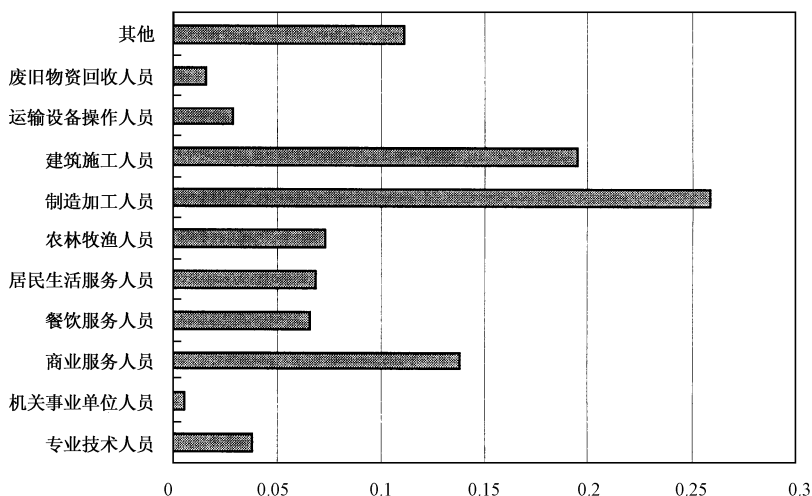
通过以上理论研究和定量分析, 我们发现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应该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 否则, 过多或过少的流动人口规模都会因破坏劳动力市场而给经济带来不良冲击。此外, 流动人口结构的科学与否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从整体上分析上海目前的外来流动人口职业构成(见图), 可以发现有近一半的流动人口集中于制造加工和建筑施工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而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金融、保险、电子等新兴产业却很少有外来流动人口在其中供职。这一方面说明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口仍然主要集中于低层次、非正规的劳动部门——虽然这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本地这些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如建筑业、加工业中的脏、累、险岗位及购物配送、社区家政服务 etc 收入不高但工作量较大的工作)供给的不足^[6], 但是, 另一方面这又充分反映了在上海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 中间层次和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 流动人口较难进入。深入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发现, 由于中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技术要求较高, 所以新增就业规模较小; 同时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亦较高, 因而整体素质较低的外来流动人口自然很难进入。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中、高层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常常附加的户籍要求与本地化倾向也从侧面限制了外来流动人口的进入, 在较浓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不完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作用下, 这无疑会加剧那些具有较高教育程度和技术素质的理性流动人口的进入成本, 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水平。因此, 要想真正使

① 该系数数值引用沈利生、朱运法(1999)的测算。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模型中 β 值的确定有待进一步改善。由于模型中建立的生产函数忽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 而这些因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变化, 所以 β 值的准确程度难免受到影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 β 值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流动人口规模的测算结果亦必受影响。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 本文依照上述模型测算出的流动人口规模只具借鉴意义。

流动人口发挥其对流入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应根据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要，科学、合理地控制流动人口结构。根据上海“十五”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因此上海市政府应该通过政策调节或

薪资、福利等经济杠杆调节来科学引导外来劳动力的市场进入，以更好地吸引更多的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流进上海，从而最终优化外来流动人口结构，提升人才吸引力和凝聚力，增强上海的综合竞争力。



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职业构成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三、结论及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在上海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市场分隔的现状下，为保证城市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上海市政府有必要对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进行科学控制。根据本文测算，建议未来三年上海的流动人口规模宜控制在 300 万人左右。同时，为实现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上海的综合竞争力，政府在上海的流动人口控制和管理中应注意对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适当控制。具体来说，政府应该设立“门槛”引导人员的流入，积极鼓励高素质的外来流动人员进入政府重点发展的行业和新产业参与竞争。

2. 本文的分析和研究表明：政府对流动人口进行控制与管理实际上是城市分层劳动力市场制度下的特定产物。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如对外来劳动力的各种政策）还常常容易导致劳动力和厂商的“寻租”行为，从而就不可避免地增加整个社

会的交易成本。所以，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要想真正使流动人口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惟有从根本上打破市场分隔、加大户籍改革力度、进一步开放中、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最终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的上海市劳动力市场。

3. 因城乡收入差距是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而托达罗模型告诉我们：“在缺乏把农村工资提高到一个充分高的水平的机制下，达到城市部门充分就业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创造额外的工作将导致更多的移民流向城市部门，后者将比所创造的工作数量更多”^[7]，也就是说，在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城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就会越多，同时，城市的失业数量也可能越多。由此可见，尽快缩小城乡差距是真正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根本保证之一。

4. 适度流动人口控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一个地区的适度人口规模和结构受到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下转第 16 页）

- [15] Coale, A., and Shaomin Li. (1991). 'The effect of age misreporting in China on the calculation of mortality rates at very high ages.' *Demography*, 28 (2): 293– 301.
- [16] Coale, A. (1993). 'Estimation of the Chinese mortality rates based on the 1990 census data.' *Manuscript*.
- [17] 同[15].
- [18] Wang Zhengjian, Zeng Yi, B. Jeune, and J. W. Vaupel. (1998). 'Age Validation of Han Chinese Centenarians', *GENU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mography*, Vol. LIV: 123– 141.
- [19] Zeng Yi, J. W. Vaupel, Xiao Zhenyu, Zhang Chunyuan and Liu Yuzhi. (2001). 'The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and the Active Life Expectancy of the Oldest_ old in China', *Pqulation: An English Sdaction*, 13 (1): 95– 116.
- [20] 同[18].
- [21] Zeng Yi and James W. Vaupel. 2003. Oldest Old Mortality in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8 (7): 215– 244.
- [22] SAS institute (2002), JMP the Statistical Discovery Software. www. jmpdiscovery. com.
- [23] 同[3].
- [24] 同[3].
- [25] Manton, K. G., E. Stallard, and J. W. Vaupel. (1981). 'Methods for Comparing the Mortality Experience of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Demography*, 18: 389– 410.
- [26] McCord, C., and H. P. Freeman. (1990). 'Excess Mortality in Harlem',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2: 173– 77.
- [27] Otten, M. W., S. M. Teutsch, D. F. Williamson, and J. S. Marks. (1990). 'The Effect of Known Risk Factors on the Excess Mortality of Black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3: 845– 50.
- [28] Zopf, P. E. (1992). *Mortality Patterns and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29] Elo, I., and S. Preston. (1992). 'The Effect of Early Life Conditions on Adult Mortality: A Review'. *Population Index*, 58: 186– 212.
- [30] Mosley, W. H., and R. Gray. (1993). 'Childhood Precursors of Adul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grams', in J. Gröbble and S. Preston (Eds.), *The 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69– 100.
- [31] 同[10].
- [32] Makiides, K. S., and S. A. Black. (1996). 'Race, Ethnicity, and Aging: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in R. H. Binstock and L. K. George (eds.), *Handbook of Ag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4th ed.). San Diego, CA: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53– 170.
- [33] Corti, M. C., J. M. Guralnik, L. Fenucci, G. Izmirlian, S. G. Leville, M. Pabor, H. J. Cohen, C. Pieper, and R. J. Havlik. (1999). 'Evidence for a Black_White Crossover in All_Caus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ortality in and Older Population: The North Carolina EPES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 308– 314.
- [34] 同[11].
- [35] Hill, M. E., S. H. Preston, and I. Rosenwaik. (2000). 'Age Reporting among White Americans Aged 85+: Results of a Record Linkage Study'. *Demography*, 37: 175– 186.
- [36] 同[35].

[责任编辑 王树新]

(上接第 33 页)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目标要求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样,一个城市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当市场完全开放,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时,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流动人口将依据市场调节而自由流进或流出,自然也就无需政府再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控制。

参考文献:

- [1] 阿尔弗雷德·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3.
- [2] 李建民. 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

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2).

- [3] 王桂新, 殷永元. 上海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 [4] 彭希哲, 任远. 人口因素与城市综合竞争力——对上海城市发展的一项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6).
- [5] 沈利生, 朱运法.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6] 王桂新, 沈建法. 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研究. 人口研究, 2001, (1).
- [7] 安妮·克鲁格.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齐明珠]